

# 论从周刊

## 无“微”不至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反思

——专访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志强



以下的生活场景对我们而言,可能并不陌生:打开手机刷微博,扫一扫玩微信,在微店购物,用微信支付付款,打开微信查询公交车实时定位,等公交时或许还能看几部微电影。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无“微”不至,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微时代”。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微时代”的出现深刻改变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微时代的文化具有哪些特征?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对“微时代的文化”应该作何评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志强日前承担着首都文化研究院重大课题“微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就此话题,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微文化”所描绘的是以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等形态为代表、以数字新媒体技术为基础、趋向个体和微小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本版编辑王敏超(以下简称“王”):**在您看来,是否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微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

**周志强(以下简称“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微文化”概念由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较早提出,我也曾在我主编的《中国图书评论》上作了一次“微文化”的专题研究。目前,这个概念已经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看,“微文化”所描绘的是以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等形态为代表的,以数字新媒体技术为基础、趋向个体和微小的新型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具有跟个微日常生活经验紧密关联的趋势。“微文化”的代表事物包括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商、微贷、微政务等等。

**王:**微时代的一个代表性通讯工具就是微信,截至2014年底,微信用户数量同比增长41%,突破5亿人。微信的广泛使用表明,媒体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微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信息的生产、传播等角度来看,微文化有哪些特点?

**周:**从传播方式来看,微文化依托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建立起来,这种技术基础决定了与此前不同的传播形态。过去信息的制作者、接触者、传播者不在一个空间,信息的传播是一种远方经验的植入,将时间或空间上距离遥远的经验呈现在接受者面前。微时代的传播模式则是点对点的,信息传播可以face to face——当然这是一种虚拟的“面对面”,但这种虚拟状态是鲜活生动的、即时的。比如我在微博或微信发一个帖子,很快就会有人来评论或点赞,表示反对或认同。这是一种在场感非常强的文化,很容易让人产生“面对面”的幻觉。

从传播主体来看,过去的传播是“精英主义的”,信息由精英的、少数的、权威人士生产,然后供大家消费。但微文化的传播主体不一定是权威人士,很可能是生活中不起眼的普通人,因此文化垄断的局面被改善了,一种丰富的多模式文化继而产生。在我们过去的文化体验中,比如看一部小说,我们可以不由自主地产生对作者的信服感,认为他的话一定很权威的;而微时代的文化体验则更多地鼓励我们与传播者对话,质疑、反思传播者给出的信息。微时代在传播主体上实现了“去精英化”。

**西方模式之外,我们需要在集中与民主、效率与公正的平衡中探索出一条新路。**

民主、自由、法治等观念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绝非少数西方国家。因此,具体政治制度在各国有很大不同,就连美国一直认为是“民主国家”的英国和法国,也存在着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和半总统半议会制政体的区别。即便是美国自身,也是左右对于选举权还有基本的财产和纳税要求,只有尽了社会义务的上等纳税人才有民主权利,自身难保的穷人、文盲、家庭妇女、有色人种都没有选举权,直到上世纪中叶中产阶级壮大后才搞普选。

一些西方学者主张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遵循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尽管该方式能够获得较大程度的社会价值认同,但仅有社会伦理原则和政治原则是无法解决政治的整合问题的,何况“无知之幕”并不存在。具体历史背景下的人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我们还需要诸如在理性的基础上发展出高级道德资源等的供应和系统设计。换言之,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民主必须与本国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相结合,否则很难有效运作起来。

事实上,“无知之幕”等理论本质上也就刻



有意思的是,从传播的内容来看,微文化自身具有矛盾性。第一,一方面微文化看似丰富多姿、多元开放,却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如去年国庆节,我发现微信朋友圈很具有一致性,即大家都在晒旅行,炫耀旅行几乎成了这七天共同的话题。再看微时代文本的呈现方式,其标题、用语以及陈述的逻辑都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和模式化,比如常见的“XX”体。这种情况让我想起美国学者彼得·鲁塞尔(Peter Russell)曾提出的“全球脑”(The Global Brain)概念。他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全球的人们因为网络的使用而最终共同拥有一个大脑——全球脑。人类的智力、体验普遍地受到电脑和网络存储的信息和知识的影响。第二,我们认为微文化是“去精英化”的,但实际上微博有“大V”,微信里也不乏追随者众的微信公众号账号,阅读量超过十万次的帖子并不在少数,名人、权威人士对于普通人的深刻影响仍然广泛存在。

**人们在微时代的碎片话语中快乐滑动,却很少去复杂化理解当下社会的基本问题和深度反思**

**王:**有数据统计,微博日均帖子数量约2.3亿条,微信日均发送量高达160亿条。在这样一个频繁、密集、多向互动的微时代,我们人际交往、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周:**这个问题涉及微文化在功能上的特点。微时代的信息传播在效果上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破坏或重组原有的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心理。我的职业是大学老师,以前在教学中是以宿舍或者班级为单位进行管理,学生的亲密关系也建立在宿舍或班级的基础之上。可是微博、微信出现之后,跨宿舍、跨班级交往变成主流了,学生在网络世界也各有各的“圈子”,小组、学生们的亲密关系因此被重组。再比如,过去要确立与他人的暧昧关系并不简单,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但现在用微信“摇一摇”,暧昧关系可能迅速就建立起来:“约吗”甚至成了一种常见的、带有戏谑意味的表达。

这其实是中国社会向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经由技术的催化所产生的文化心理上的结果。过去我们总是跟熟人打交道,现在我们是跟陌生人一起生活,我的一对一学生结为夫妇,一个是新疆人,一个是海南人,他们结婚时双方父母才认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微博、微信等通讯工具让我们觉得可以建立一个熟人圈子,并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而不再是一种陌生人的困境,这有助于克服在陌生人社会生活的焦虑。我们在微信圈子里更多的跟“轻熟人”交往,这抵抗了对陌生人的焦虑,重

组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建构了一种新的生活伦理。

**王:**在微时代的公共舆论空间中,以辱骂、人身攻击、“打棍子”、“扣帽子”等方式来讨论问题并不少见。您怎么看公共舆论空间中的那些情绪化的表达?

**周:**我曾撰文《是“青春文化”,不是“青年文化”》,思考在消费主义背景下的青春文化,如何坚守理想主义热情的话题。但是一些网络媒体将此文以“《人民日报》痛批青春文化低幼化装疯卖萌谈欲望”为主题推送,然后这篇文章就在网上火了。我看了一下几个大型网站的跟贴,仅有少数人冷静看完了文章,并且客观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大部分网友看到这个题目就开始骂,用词还甚为激烈。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深思。在微文化的信息传播中,微博最长仅140字、微信小屏的阅读量为800字,大家更多的呈现一种浅表性的、情绪发泄的过程。网友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是通过关注、围观来改变现状,不如说通过谈论社会问题来发泄不满,或者享受吐槽的快乐。

我认为这是微时代的媒介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介不能相互替代的原因,主流媒介用一种理性化的、有深度的、较为全面的陈述,提供一个对于当下的“完整知识”或者“世界图景”,来帮助我们对社会的理解,让我们知道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是微文化很难提供一个“世界图景”,反而会而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给人一种零碎感。如果失去了主流媒介,我们将会陷入破碎、零散、焦虑、无助的感觉中。微时代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思想模式:人们在微时代的碎片话语中快乐滑动,却很少去复杂化理解当下社会的基本问题和深度反思。这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力量与性质。

**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周:**第一,微时代充斥着这样的话语形态,其特点是“全部是判断题”,提供给信息接受者的仅仅是结论,却并不告诉你“为什么”,不呈现结论的来龙去脉和对世界的思考模式。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追风是中国社会的集体焦虑感》,分析国人爱追风其实是因为一种集体焦虑。因此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在于下一个判断——“国人爱追风”,而是重在分析、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个体的无助感是怎么产生的,与社会保障等制度设计有什么关系等等。

但是微时代很难,或者较少提供这样的阅读体验。微时代的话语传播更像是一种“狙击式聚焦”,瞄准一个核心目标,切断其与四周世界的联系,并将之放大为一场重要到极点的事件,其后果是抹平诸多社会故事的具体性,放弃对复杂社会的“复杂阐释”。这样,阐释性话语的魅力衰减,一旦阐释性的解读与微话语的“常识”体验相违背,这种阐释就会立刻遭到质疑。

越来越多的微话语致力于用新的“真相”代替旧的“真相”;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性叙事,被切割成情绪化的碎片拼贴在片刻不离手的手机上面,令人们一惊一乍地阅读并叹惋。追求震惊效果,将问题变成跌宕起伏的梁山好汉的情节,这已经是微时代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第二,微时代纷繁流动的信息,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社会信息管理系统过滤。帖子里的信息是真是假难以辨认。绿茶到底是否会致癌?刚买回来的新手机,是否需要第一次把电池电源用光再充电?如果你翻阅网上的帖子,很有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这种真假难辨的情况容易让人陷入破碎感、茫然感。

第三,微时代人人都有转帖的权利,但是点击转发很快地让这些流动的话语变成无主体的言论。在不断的转发中,传播者作为行为主体的意识消失,不断地说着别人的话,并且按照微时代的话语规则说话。这最终成了一种“口香糖思想”的传播方式,或者说用咀嚼口香糖的方式

在“思考”:无论什么味道,一律最终变得无味,而这种“无味的味道”又总是在人们的口中穿来穿去,只不过是添加了一点充满思想泡沫的口水。说了很多,却其实什么也没说。

**深挚的同情、深刻的质疑伴随迷茫的道德冲动,让微时代的网络广场无法摆脱种种非理性缺陷**

**王:**微时代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改变。微信息的传播与互动,为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为公众意愿和诉求的表达、甚至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和政策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然而,公共舆论空间也不乏喧嚣浮躁、疏离虚无的表达。微文化到底是提升了,还是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表达?

**周:**微时代会形成一种网络聚集现象,比如在微博、微信上能很快形成一个网络的舆论广场,成为社会政治情绪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这对于社会管理的启示是,在政治情绪的消化过程中,社会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政治理性、行政程序,还要引入社会情绪管理。社会管理者要能够与民众有效沟通,争取在情绪和情感上与民众产生认同,达成共识。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舆论广场上的一些场景,如“阴谋论”横行;再如只要涉及到社会公正问题的帖子,人们就会宁信其真,不疑其假;还比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呐喊”:“看看真相吧!救救他们吧!”

简单地讲,到目前为止,微话语一方面在监督和质问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却用它特有的“呐喊话语”损害社会公信力。在这里,前者让人们相信网络广场政治会让社会越来越公正,后者让人们暗中形成对现有社会管理方式的整体沮丧感。前者倾向于认为微话语是个好东西,会成为社会民主的重要形式,后者则让人们益发充满热情地在网络广场上面展示良好社会愿望,并把对社会的管理体制的批判变成浸泡着口水的嬉笑性攻击。

自媒体时代的每个个体似乎都有发言的机会,都有表达的热情,都是独立思考的个体。然而,人们身处人声鼎沸的网络广场上,会滋生一种无法名状的孤单感,每个人都暗含着理性丧失和个体被淹没的倾向。近似于德国哲学家弗洛姆所说的倾向就会出现:人们会在一种茫然感中产生自己应该做点什么的冲动,并且,倾向于跟最能感染自己的声音来采取行动。这种倾向,往往在群体中造就混乱,盲从和非理性化冲动。于是,网络广场容易成为一个充满道德感的场所,用道德情绪代替理性管理体制。微时代的网络广场无法摆脱种种非理性缺陷,对微时代的话语平台和公共交往空间,要有序引导,让知识理性、现实理性成为主导力量,以改造建立在“宣泄情绪”基础上的“呐喊话语”。另外,当被切割成片段化的、情绪化的、极具煽动性和误导性的信息袭来,理性思辨能力和协商精神缺乏的接受者往往会呈现出情绪化的歇斯底里。因此,公众独立自主,反思性的理性意识也亟待充分地建构。对于微时代的人们而言,仅仅是用手机点击一下鼠标,是远远不够的。

微时代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关注个体、关注个性、关注自由的时代,为解决当下的种种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微时代与微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实际上,世界并没有因为鼠标的点击、手指在移动终端的运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微时代带来的改变,是否正在按照人们良好愿望的方向进行,是值得警惕的。

## 民主的解释不只一种

□ 王世奇

设计的“理论”、“道路”如何精妙,与制度能否在现实中生根并发挥作用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制度生存往往与特定的文化土壤有关。换言之,制度不能从单纯的政治思想出发理想地建构,更难以机械地移植和照搬,因为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与“隐形的制度”互补。例如,一辆汽车相对人的不同需要,就具有多维的价值关系:科学研究的、审美的、经济的意义,等等。主体必然会选择客体的某些价值而放弃其他价值,任何的“价值”都必然是非普世的,因为“价值”是由主体所决定的。国际关系既不浪漫,也不虚幻,而是各种利害考量的结果,是赤裸裸的现实的反映。当某些政治势力自诩某种“世界观”是“普世价值”,最有可能性的是出于“迷信”或“忽悠”他人,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如美国之所以一再倡导“新自由主义”,其盘算的就是利用它的美元霸权,通过操盘外汇、期货等资本市场,或金融殖民,巧取豪夺世界财富,或干涉别国内政,扶持其政治代理人,或不见血地搞跨别国经济民生,维系其“世界警察”地位。

民主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性,这已是世人皆能看到的事实。当前,全世界还缺乏对民主的精确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强权国家从程序因素理解民主权利,这种观点已被广泛批判。联合国大会也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不断通过决议确认,一国享有选择其政治道路的权利。今天,全球经济和生态变化以及由西

方垄断控制的经济秩序使我们无法重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老路,而必须制定和执行自己特色的现代化战略和计划。我们必须以独立自主的心态加强自己选择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唯洋是举”必然会使我们得到让人失望的结局。西方民主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取得巨大成绩以后,西方高傲的宣称“历史已经结束”,人类不可能超越民主制度了。结果,福山的话音未落,民主的缺陷层出不穷地暴露出来:经济上大幅被中国赶超,日本陷入长达20年的停滞,08年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希腊等国因受制于民意,仍然没有找到走出衰退的好办法,面对恐怖主义,西方国家软弱无力。

任何制度的创设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社会是在不断演变的,只要过一段时间,再好的制度都可能产生弊病,民主制度也不例外。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本质上就是由400万人决定6300万人的前途,其中的荒唐不言而喻。在该制度下,急功近利的民众为了眼前的一点好处就可以放弃长远利益,可是,分离对苏格兰人来说说是真的利大于弊吗?政客往往为了迎合选民的一时利益就煽风点火,如在印度、埃及、泰国等公投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因此,如果多党民主制造就不妥协的暴力选举集团,那么党争有理的民必会选择能维护社会稳定的一党执政。须知民主的发展进程永远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民生和国家富强等多方面的目标相伴相生的。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 学林漫笔



## 动手动脚找东西

□ 王学斌

**学术研究在倡导理性的同时,依然需要养成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更多依靠与现实社会接触得来。**

1928年,胸怀壮志雄心且锐气十足的傅斯年,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文章开篇,傅氏即对历史学进行颠覆性的重新解释:“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者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取厚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围,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循此思路,若学人继续先人研究路数首故纸堆中,便是退步,唯有主动直接接触研究材料,方算进步。愈往下讲,傅氏之言论愈发激进,终于抛出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此观点看似石破天惊,实则既反映出彼时新式学人对学界现状之不满,亦体现了他们对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借鉴。这折射出学术范式正在转型的趋势,故傅斯年并不孤单,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

早在三年前,傅斯年的同窗好友顾颉刚便开始“动手动脚找东西”了。顾1912年就已进京读书,不过悠悠十几载,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扑在典籍之中,自然对京师风俗民情了解甚少。直到1924年暮春,顾游览西山,正逢农历四月初八妙峰山进香的季节。顾发现以往每次来时关闭的那座小茶棚全都开了,进香的人摩肩接踵,在茶棚周围撞击着,唱着喝茶唱粥的歌谣,并不时磕头,而各种数不胜数的香会会帖贴满山道两边,这不禁引发了顾氏的好奇与愤怒。次年,顾“忍了一年,会帖又出来了,这个好奇心再也不能制止,就请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主任沈兼士先生派我们去调查”。沈只给了考察组微薄的50元作为经费,故他们来回首尾仅三天时间。不过这丝毫未影响顾氏的兴致,“到妙峰山看烧香,想了好几年,今日乃得实现”。

顾颉刚素来是位极其内敛甚或害羞的读书人,然而由于在去年的香会上,“我的心中时痒得很,恨不得把这些东西立刻抄来,但又老不出脸皮当着许多走路的人的面前抄写”,于是不久风雨侵蚀,大部分会帖零落殆尽。顾此次上山,立下坚强的志愿,争取一张不落,要抄录一个全份。据他回忆,“抄录会帖是从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一班香客都很注意,他们聚着看我。我本来很怕羞,更经不起他们的注意,要不是受了压抑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现在居然把它们抄完,虽是有许多快乐得简单,总算得到了一个大胜利,我真是非常高兴的!”想必顾氏此间的“快乐”,不仅是满足于抄录这么多会帖,恐怕还包括战胜自己羞怯个性的那份自豪吧。

会帖会单要克服自己的性格,还十分考验体力。顾颉刚与组员早上四点半就起身抄录,一直忙到傍晚。这令本来身体孱弱的顾颇有些吃不消,“在半山亭抄录,忽左忽右曲筋,痛甚”,晚间“用烧酒擦足甚久,终不愈”。第二天下山之际,顾颉刚痛得厉害,“步履极艰难”,至玉皇顶,即唤肩舆赴三家店。待到了返回住所的路上,他不禁“又起愁怀,心酸下泪”。可见“动手动脚找东西”之代价,着实不菲啊!

有付出,则必有回报。通过会帖,顾统计出当年九十九个香会的名称、地域分布、会费募集方式、会规、组织结构、物品用途甚至香会的历史和民俗变迁,可谓收获颇丰。无怪乎其弟子钟敬文评价称:“十年前的一个春天,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的几位青年学者,做了一件惊人的学术大事,那就是……妙峰山香会调查。妙峰山的香会,是北方一个巨大的民众宗教活动……这种巨大的民众活动,除了受鄙薄之外,恐怕不会更牵动读书人们的心……这几位学子的,竟竟充了朝山的香客,深入圣地去了。他们用科学者的智慧之光,给我们显示了那一角被黑暗蒙蔽的民众的行动和心理”。作为当事人,顾的体会更值得参考:“我们知识阶级的人实在太暮气了,我们的精神和体质实在太衰老了,如再不吸收多量的强壮的血液,我们民族的前途更不知要衰颓成什么样子了!强壮的血液在哪里?强壮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自己民族中的下层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人类的新鲜气象是一种。”

不惟民俗学需要实地调研,其他学科亦是如此。譬如经济学。时在南开工作的经济学家何廉十分关注地德业,起初他采用的是在美国极为普遍的做法,向调查对象分发征询意见表。孰知他碰了一鼻子灰,“被调查者干脆拒绝填写这些表”。何只好放下教授架子,亲自跑到天津地德业的各个厂家进行个别交谈。然而这一招也不灵光,“我不熟悉他们的行话,我是个外来人,把他们全都吓跑了”。更令何几近抓狂的是,调查对象实际上毫无数字概念。如果问他们有多少资本,他们就回答“没多少”。如果问他们挣多少钱,他们就回答“很少”。何即使再次重复问“有多少”?答案依然是“很少”。如果问“你们每天干几小时活”?他们便回答“时间很长”。这种情形搞得何廉一时束手无策。经过反思,何终于找到问题根源所在,选择了符合当地情况的方法。他用诱人的薪水雇佣了两名长期从事地德业行业的工人作为调查员,并花大量时间培养他们的业务能力。等培训完毕,两人按照何的要求去搜集情报,果然工作大为改观。他们记录的精确数据使何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此看来,作为学者,在动手动脚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还得始终保持“动脑”。

现如今是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只要你拥有一部手机或电脑,便可获取海量信息。作为学者,各式各样的电子数据库也使得研究日益便利。不过纸上、屏上或掌上资源的发达,也无形中与研究与现实区隔为两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看,无论人文科学,抑或自然科学,在倡导理性的同时,依然需要养成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更多依靠与现实社会接触得来。是故对于学人而言,与其终日闭门造车“想当然”,不如适度动手动脚“接地气”,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王敏超